

引言：东风西风话十年

1957—1966年在共和国历史上永远是非常重要的十年。

对于这十年，人们有各种叫法：“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年”，“曲折发展的十年”或干脆称之为“前十年”。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共和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经历了多次严重挫折，最后无可挽回地被她的缔造者带向了全面内乱。中国人民在“翻身做主人”之后又经受了一场浩劫。

当人们重新审视这十年时，就会发现，这十年是共和国“多风”的季节，全国人民不断地被卷入一阵阵“风”中，国民经济也一次次在“风”中飘摇。无日无“风”，无时无“风”，是这十年历史的一个显著特点。

本来，中国共产党挟建国之威，仅用了七年时间，就将一个谁见了都会泄气的烂摊子收拾得井井有条，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戴，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然而，历史的习惯与辉煌的现实，逐渐将毛泽东树成了神。在传说中，神能够呼风唤雨，而在现实中，毛泽东的确有了这个“法力”。他“兴风”之术变幻无穷，随心所欲，一次又一次地将中国带进他唤起的风暴之中。

毛泽东辨“风”之能更堪称超群，在朗朗乾坤之下，不断察觉到“黑暗风”、“翻案风”、“复辟风”，在他的眼中，这些都是“西风”，以

“东风压倒西风”占去了毛泽东很大一部分精力。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公认的领袖，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的原因，是他坚持实事求是，深谙中国国情；在社会主义时期，他之所以犯错误，又恰恰是因为脱离实际、主观空想。他大量读书、勤于思索，但并没有找到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道路。相反，却步了他早年就批评过的“本本主义”的后尘。这个“本本”就是他头脑中已经形成的、不容改变的观念。尽管在实践中一再碰壁，但他从未试图真正转变观念。他也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设想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当然是那些与他一道出生入死、共同奋斗过来的战友们。当毛泽东煽起的“共产风”、“跃进风”、“浮夸风”刮乱了国家，使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的时候，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说的一段话也许最能表明毛泽东的想法。林彪是这样说的：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

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并不缺乏清醒的头脑，也不乏智慧和勇气。可是这一切，在毛泽东巨大的影响面前都显得如此无力。每次毛泽东鼓起的都是“十二级台风”，而被毛泽东斥为“十二级台风”的不同意见，充其量只是“吹皱一池春水”的微风。整个社会看起来整齐划一，步调一致，实则动荡不安，人心不安。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地冲击着人们的思想，中国的变化之快，达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整个中国像一个大工地，像一个大市场，乱哄哄、热热闹闹。但认真审视之下，人们不难发现，今天的中国，实际上是建国以来

最为安定的时期。从党中央主席到平头百姓，大家都在按照邓小平所说的‘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去生活、去工作。惯于兴风作浪的人的市场越来越小，人们对空喊口号和不着边际的上纲上线的兴趣越来越淡。中华民族终于恢复了求真务实的本性。

“文革”前十年，为人们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也为人们留下了享用不尽的思想材料。不断反思“文革”前十年的历史，对于我们每一个当今生活在改革开放时代的人，在八面来风之中站稳脚跟，都会大有帮助。

1957 事情正在起变化

清醒的头脑变得不清醒了 毛泽东原来判断“不是七级台风”后来认为“事情正在起变化”是“惊涛骇浪”，于是整风变成了反右，于是知识分子首当其冲

在共和国的记忆里，1957 始终是一个沉重的年份。

本来，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在八大中就明确宣布：

“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

不但如此，八大还向全世界公开表明：

“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的状况间的矛盾。”

如果我们年轻的共和国沿着这样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那么，走入 21 世纪的中国，一定是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

可惜，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就是“如果”这样的词语，用在历史过程的描述上，带给人们的也只能是感叹和遗憾。

于是，人们为八大的路线没有坚持下去而惋叹。

导致八大路线夭折（用这个词也许严重了点）的第一个因素，便是 1957 年夏天那场突如其来的大反右。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冲击波

1957 年 1 月 毛泽东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 颇有感叹地对与会者说：“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 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

对于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来说，1956 年的确是多事之秋。

这年 2 月 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二十大 作为兄弟党 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以朱德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苏共二十大自开幕后，一切都很正常 到 2 月 25 日 大会主席团宣布闭幕。可就在这个时候，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扔出了一颗令各国共产党人大为吃惊的重磅炸弹。

这一天，出席苏共二十大的各国共产党代表团都在作回国的准备了。于是 赫鲁晓夫撇开兄弟党代表团 作了一个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这个秘密报告的核心，是揭露斯大林制造个人崇拜及其产生的严重后果，对斯大林来了一个全盘否定。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

我这个报告的目的不在于全面地评价斯大林的生涯及其活动，对于斯大林的功绩，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有无数这方面的书籍、小册子及研究性文件，对他在苏联革命和建设中所起的作用，作了大量的宣传。我们现在关心的是一个无论现

在，还是将来对党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到底是怎样慢慢滋长起来的，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紧接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问题一个一个地摆了出来：

欣赏个人崇拜，亲自把称赞自己的话写进斯大林小传中，从古到今没有这样自吹自擂的人；

性格粗暴放肆，独断专行，滥用重大权力，给党以无法估计的损失；

在肃反斗争中，把党内思想斗争的问题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混为一谈，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夕，缺乏必要的警惕，战争中按地球仪制定作战计划，搞瞎指挥；

随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苏联国内作了传达。这么重大的问题被揭开，苏联国内却没有出什么乱子。苏联并没有太多的人对赫鲁晓夫把斯大林说得一无是处想不通，原因是斯大林当年的大肃反把党内党外都整得太寒心。

30年代的苏联大肃反，对苏联人来说，称其为一场灾难并不算过分。无数无辜的党员、群众被逮捕、流放乃至处死。仅苏共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遭逮捕、处决者就达83人。军队高级将领的命运就更悲惨了。苏军高级军官中，被处死的人数令人触目惊心：5名元帅中有3名，15名兵种元帅中有13名，85名军长中有57名，195名师长中有110名。而被处决的人中，绝大部分人的罪行要么是“莫须有”，要么就是不实之辞。

正因为如此，苏联党内外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大都持赞同态度。

但这个秘密报告却使社会主义阵营的波兰和匈牙利发生了两次强烈“地震”。

既然是秘密报告，赫鲁晓夫的本意是对国外保密、不加公开的，所以这个报告之后一段时间，各国共产党内对报告的详细内容并不知晓。

可是，三个月后，无孔不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终于弄到了报告的全文。当时苏美冷战正打得难解难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正在为想方设法搞垮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绞尽脑汁。得到这个报告后，美国如获至宝，认为这不亚于找到了一颗投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原子弹。于是，马上把报告的全文向全世界公布。

赫鲁晓夫没想到美国会来这一手，一下子傻了眼。

这颗“原子弹”一爆炸，受其辐射最严重的便是波兰和匈牙利。美国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公布不久，就相继发生了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

波兹南是波兰西部的一个城市，1956年6月，该市的斯大林工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减税，由于增加工资的要求遭到拒绝，工厂数千名工人罢工，走上街头。随后，引来了众多同情与围观的群众，在市中心的斯大林广场上聚集了数十万的人群。随后，工人与政府从华沙派来的保安队和坦克发生冲突，演变成骚动和流血事件。在冲突中，53人死亡，270人受伤。

波兹南事件后，1956年7月18日，波兰党举行中央全会，研究事件的原因，认为“寻找事件的原因时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煽动者和帝国主义走狗的阴谋上去，那是错误的”，极大部分的责任要归中央和地方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和愚昧无知”。

波兰党还认为，波兹南事件是一个警告，它证明在党同人民各

阶层之间的关系方面存在着重大的错误。为此，决定要采取措施，克服缺点，改善人民生活，合理管理经济及实行政治生活民主化。

应该说，波兰党的这个看法是明智的，也是符合实际的。

10月19日波兰党举行全会，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成员，哥穆尔卡出任第一书记。

哥穆尔卡出任波兰党总书记，却犯了莫斯科之忌。

哥穆尔卡在1943年就已担任波兰工人党总书记，波兰解放后，除担任党的总书记外，还兼任临时政府第一副总理。他不赞成全盘照搬苏联模式，主张波兰应走自己的建设道路。由于斯大林的压力，波兰党被迫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

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主义的盖子，却把斯大林的老子党作风继承下来，当他得知哥穆尔卡复出后，便急急忙忙赶到华沙进行干预，但被波党中央顶住。

波兹南事件一波刚息，匈牙利事件又涌现出来。

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没有斯大林那样的本事，却把斯大林的个人独裁、个人崇拜那一套全学来，在党内大搞清洗运动，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引起党内党外的强烈不满。斯大林去世后，拉科西被迫交出了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只留任党的总书记。

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一职，由纳吉担任。纳吉不同意拉科西教条主义那一套，对匈牙利的政治、经济体制作了一些初步的改革。毫无疑问，纳吉的改革实际上是对苏联模式的改造，这很快引起了以“老子党”自居的苏联领导集团的不满。在莫斯科的压力下，纳吉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旋即被开除出党。匈牙利的改革幼苗被西伯利亚的寒流冻杀了。

受苏共二十大的冲击，长期受苏联干涉的匈牙利人的改革欲望

得以复苏，党内出现了纠正盲从苏联的错误，走自己建设道路的要求 随之局势出现不稳。

1956 年 3 月 17 日，一批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裴多菲俱乐部，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议讨论和宣传活动，并造出让纳吉复出的舆论。拉科西企图对此加以镇压，但控制不了局势。匈牙利局势的变化，引起了苏联领导集团的不安。7 月，苏共中央派米高扬赴匈，要拉科西辞职，由格罗接任第一书记职务。匈共中央也作出决议，试图克服面临的政治、经济困难，但格罗把拉科西的各项政策全都继承下来，并无改革迹象，未能解决问题。

波兰的哥穆尔卡复职的消息传至匈牙利，匈牙利人立即呼喊出了拥护纳吉的口号。10 月 23 日 在首都布达佩斯发生大规模的群众性动乱，旋即演变成武装冲突，军事仓库、电话交换台、电台、报社被群众占领。

当晚，匈共中央决定由纳吉出任总理。24 日上午 匈共中央又宣布请苏军出兵，但动乱未得制止，各种人都加入到动乱的浪潮中来。24 日下午 米高扬又跑到布达佩斯 要格罗辞职 由卡达尔任第一书记 纳吉复任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于 28 日要求苏军撤兵，30 日下午宣布苏军已开始撤退。

可是，31 日夜和 11 月 1 日凌晨，苏军第二次自行出兵匈牙利。在这种情况下 匈内阁会议决定退出华沙公约 宣布中立 并向联合国呼吁要求四大国帮助维护中立。11 月 4 日 纳吉被免职 由卡达尔为总理新组成的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6 日 匈共宣布更改党名为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了以卡达尔为首的临时中央，调整和着手重建党的组织，匈牙利事件遂得以平息。

对于匈牙利事件的评价，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事隔

三十年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在 1989 年 2 月的一份公报中说：

在 1956 年，领导在革新方面的无能为力导致了政治性爆炸，爆发了真正的起义——人民起义。在这次起义中，民主社会主义的力量起了作用，但从一开始就混杂了企图复辟的势力、社会的残渣余孽和声名狼藉的分子。到了 10 月底，反革命行动增多了。

发表这份公报的时候，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还是执政党。

不管匈牙利事件的性质如何，它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冲击却是巨大的。

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处理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对于匈牙利事件，中国领导人十分关注。那时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虽然波匈这两个小兄弟家里出了问题，但总的来说，内部尚还团结。作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中国希望波匈两党两国能妥善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

波、匈事件深层次原因，在于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苏联领导人推行的大国沙文主义。中国对苏联领导人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的作为，也是不满的。同时也认为，匈牙利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激发，转化为敌我矛盾的结果。毛泽东曾说：

匈牙利的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结果使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长时期才能

恢复。

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

自 1956 年 9 月起至 1957 年春天，中国的一些城市发生了数十起共约近万人的工人罢工请愿事件，30 起共万余学生参加的罢课、请愿活动。在农村也发生了退社风潮，有的农民还进京告状。

毛泽东关注着这一切，形势的变化使他不得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理论系统地进行研究。

1956 年 12 月 4 日，他在给黄炎培先生的信中写道：

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里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

1957 年 1 月，中共中央将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召集到北京开会。毛泽东在 1 月 18 日和 27 日作了两次讲话。27 日的讲话，毛泽东主要讲了如何辩证地看待当时的国内外形势。

在讲话中，毛泽东专门讲了如何对待闹事的问题。他对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们说：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

社会上的事情总是对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少数人闹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的方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对立的阶级，对立的意见。

不过，毛泽东对当时的形势看得并不严重。他用轻松的语气说，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们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又说，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还说，一个工厂，一个合作社，一个学校，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总之，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对立的方面，所以，社会上少数人闹事，年年都会有。

参加会议的各地封疆大吏们，有的对出现闹事现象十分紧张，毛泽东对他们说：

我们共产党历来对帝国主义、蒋介石国民党、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不怕，现在倒怕学生闹事，怕农民闹社，这才有点怪哩。对群众闹事，只有段祺瑞怕，蒋介石怕。此外，匈牙利和苏联也有些人怕。

毛泽东还告诫与会者，对闹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数人、少数人区别开来。即使对于带头闹事的，也要分析，有些人经过教育，还有可能成为有用之材。对少数坏人，除了最严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关，不要开除。只须剥夺他的政治资本，把他孤立起来，利用他当反面教员。开除之类办法，简单是简单，爽快是爽快，但是容易不得人心，并不能妥善解决问题。

对于民主人士怎么办，毛泽东说，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

他们批评。如果不让他们这样做 压制批评 就有点像国民党了 国民党是很怕批评的。而且民主人士的批评，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错的可以反驳 不错的可以补充共产党的短处。毛泽东接着说：

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 争取多数 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 就让他们闹够 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

即便如此 毛泽东仍然认为 学生闹事 梁、彭、章等人放“屁”，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因而他提醒与会的高级干部们：

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讲到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区分与处理问题。

当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命题加以展开论述，是他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这天 他一口气讲了 12 个问题：一、两类性质的矛盾；二、肃反问题；三、农业合作化；四、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革；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增长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七、统筹兼顾 适当安排；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问题；十、人民闹出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民族的关系问题；十二、中国有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根

本改变面貌。

这十二个问题，核心就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人民内部仍存在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敌我之间的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不同，处理和方法也不相同。

敌我矛盾只能用专政的方法，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 这就是团结——批评——团结。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

“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

二十天后，毛泽东出巡，天津是他此行第一站。3月17日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现在全党要学会率领整个社会向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大体上改变一下。社会上各种不同的意见，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暴露出来，有许多错误议论，我们采取什么方针，在讨论中去解决。我们只有这样一种方法，别的方法都不要。

“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头脑是十分清醒的。

第二天，专列把他载到泉城济南，他对山东省委机关的党员干部们说道：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八次大会作了结论的，

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这么大斗争的结束，那么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

3月20日毛泽东到了南京，他将南京部队和江苏、安徽两省委的领导干部召集起来，告诫他们：过去的那种斗争基本上结束，基本上完毕了，我们在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3月底，他又提醒上海的党员干部：现在是一个转变时期，在我们面前的新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团结全国人民，同自然界作斗争。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详细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在毛泽东大讲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党的中心工作是向自然界开战，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党内的其他领导人也在思考这一问题。

对此思考得最多的，恐怕是党内第二把手的刘少奇。

他对这个理论的认识，决不亚于毛泽东对这个理论的创见，可以说是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的重要人物。

毛泽东去华东视察的时候，刘少奇也离开了北京，开始他的中南之行。

1957年2月24日刘少奇在同石家庄市地干部谈话时说：阶级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了，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突出了。阶级的矛盾在国内降为次要的矛盾了，这是新情况。关于中国会不会发生

匈牙利事件，刘少奇说，如果具备下面四个条件的话，是可能的：一、我们犯了长期的路线上的错误 二、处理方法错了 三、被反革命利用 四、党内有人领导。

3月4日，刘少奇在河南省委组织的一次会上作了讲话，他直截了当地说，群众闹事的原因，就是现在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敌我的矛盾。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新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地表现出来的。一方面人民闹事 罢工 游行示威 请愿，另一方面我们领导机关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起来了，这是国内政治形势的一个基本特点。

20天后 刘少奇回到了故乡 湖南 在湖南省委干部会议上 刘少奇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作了精当的论述：

生产力跟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的矛盾。在私有制度的社会里，这两个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社会里，这两个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

4月底，刘少奇也到了上海，又一次阐发了如何对待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刘少奇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说：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主要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

人民内部的矛盾，大量的表现在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方针可以着重它的同一性。

处理敌我矛盾是强调斗争性，使矛盾紧张起来，使斗争激化起来，以至于把矛盾的对方压倒，消灭。如果我们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强调同一性，使人民内部的矛盾没有必要地紧张 激化起来 造成紧张局势 那就是错误的 那就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错了。

人民内部的矛盾 本来是非对抗性矛盾 可以不用对抗的办法，不要用一棍子打死的方法，可以用人民民主的办法，和风细雨的办法，来解决矛盾。

刘少奇在讲话中还表示：

我们没有必要去强调斗争，故意的，人为的使斗争激化，使斗争紧张起来，似乎要制造斗争的样子，似乎斗一下我们才舒服，好像我们就有那么一种嗜好，不斗一下就不过瘾。

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应该说，刘少奇的理论性、思辨性是颇为卓越的。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刘少奇功不可没。“文革”中硬说刘少奇一贯反对毛泽东 确实是天大的冤枉 至于说刘少奇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更是无稽之谈。刘与毛关于社会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分析，在 50 年代并无原则分歧。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把他在 2 月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作了整理，又加进了他在地讲话中的一些新提法，使之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 并于 1957 年 6 月 18 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 公开发表。

整 风 的 初 衷

1957 年的春天，中国的政治气温本来不错。此时 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又明确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于是，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对全国人民说：

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